

序言

歷史不止一種寫法

讀高華這本書

我開始對歷史學產生興趣，純粹是因為讀了高華教授的著作《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：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》（以下簡稱《紅太陽》）。那時我正在北京廣播學院攻讀新聞傳播學碩士，滿腦子都是後現代主義理論，一知半解，卻彷彿拿到了一把管用的榔頭，在現實中到處尋找可以敲一錘的釘子。碩士第三年，有老師告訴我，南京大學副教授高華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一本書，特別震撼，應該找來讀一下。這本書在內地是一本禁書，我沒有渠道獲得，着急上火。我想最好聯繫作者，看看能否借閱或購買一本。我在網上搜到高華教授的電子郵箱，冒昧發了一封郵件。一段時間後，居然收到了回信，他讓我向一位在北京的教授借閱，此人有一本高教授的贈書。

閱讀《紅太陽》一書的體驗至今難忘，彷彿古人雪夜閉門讀禁書，不亦快哉！我當時完全是中共黨史的門外漢，沒有讀過史

料，頭腦中只有教科書上的那套敘述。作為一個厭倦了官方宣傳的憤青，我尋找一切機會自我啟蒙，對任何顛覆權威、褻瀆神聖的觀點興趣盎然。高華教授對延安整風運動的解釋，完全顛覆了我的史觀，有理有據，令人興奮且信服。尤其讀到他對「毛氏新聞學」的分析，感覺他說出了中共新聞學的本質，一針見血。在北京廣播學院上「新聞學原理」課程時，我就覺得那套論述難以讓人信服，只是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裏，高華教授解答了這個疑問，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。跟高華教授電子郵件來往幾次並獲得鼓勵後，我決定在獲得新聞傳播學碩士後，報考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，跟他學二十世紀中國史。

準備博士入學考試真是一件無聊透頂、卻又不得不做的事。南大歷史系博士生入學考試的指定教材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新編中國通史》。該教材枯燥乏味，實在不知「新」在哪裏？我都讀過《紅太陽》了，如何還能讀得下這種教材？我選擇跟隨高華教授讀博士，就是要顛覆那套主流話語。諷刺的是，要想通過博士生入學考試，卻必須先掌握那套我想批評的官方話語，這就是我們在中國經常會碰到的「二十二條軍規」。硬着頭皮看教材外，我也尋找各種近現代歷史學專著過目。我自知非科班出身，歷史知識淺薄，亟需補課。半年裏，我讀過多本受益匪淺的好書，如茅海建的《天朝的崩潰：鴉片戰爭再研究》、王奇生的《黨員、黨權與黨爭：1924-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》，這些書都讓我覺得史學是一門講究積累的學問，須下苦功夫讀史料才能言之有物。

要說印象最深的書，還是美國歷史學家柯文 (Paul A. Cohen) 的《歷史三調：作為事件、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》(*History in Three Keys: The Boxers as Event, Experience, and Myth*)。翻譯的書常有一種翻譯腔，難以卒讀，但這本書我讀得津津有味，感覺美國人做歷史，有情趣、富想像力。讀完後，我覺得從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學到的關於歷史是什麼、如何理解歷史的說法，都是錯的。尤其是《歷史三調》中之「神話」面向，即歷史通常被當權者根據現實需要，不斷加以改寫，幫我想通了當下的很多問題，也與我當時正在生吞活剝的一些後現代理論若合符節。

當時國內的自由主義學派和新左派爭論正熾，他們對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中國有着不同的、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釋。高華教授也是這一論爭的參與者，他在2003年12月12日曾接受《鳳凰週刊》的採訪，發表了題為〈毛澤東是重大的歷史現象〉的文章，批評新左派的觀點，指出他們的立場之所以錯誤，就在於「多不是歷史學家，基本在文化批評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」。因此，我對歷史學這一常人眼中的冷門學科充滿了信心，相信到南京大學讀歷史學博士，在高華教授的指教下，就可以「客觀」、「正確」地認識毛澤東及其時代。

南京大學給予我的學術氛圍，自然是遠在北京廣播學院之上。博士生課程不多，我除了必修課外，主要是聽高華老師的課，無論是給本科生開的課，還是研究生的課，我一門不落都去聽，包括「中國現代史史料學」、「二十世紀的政治與文化」和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」等。在南大時，我在史學方面的收穫，大多來

自高老師。高老師對黨史有深入研究，口才卓然，常在港臺交流，對前沿的學術動態及海外學者的研究也比較瞭解，他的課不僅信息量大，還常有新意。除了本系學生，外系外校學生和社會人士也常常慕名而來。有時候為了確保坐在下面的人都是學生，而非秘密警察，高老師還會要求可疑人士出示學生證。高老師在課上主要宣講自己的研究和看法，有時也穿插一些他的朋友們的看法。因為崇拜高老師，我聽課時拚命記筆記，不肯遺漏隻言片語。他課堂上說過的話，很多我至今還記得，甚至仍能回憶起他講某句話時的體姿與表情。我這輩子聽課，從來沒有這麼投入過。他的觀點立場基本屬於國內的自由主義學派，我固然因為他是我的導師，傾向於同意他的看法，但我那時已經瞭解了一些新左派的觀點，知道對於歷史，不同派別有不同的解釋，也很想知道他的批評者（如新左派）究竟錯在哪裏？該如何反駁他們？我有時在課堂上直接問一些頗有挑戰意味的問題，再加上本人當時無知無畏，以為真正的學術討論就是要口無遮攔，必要時還應六親不認、為真理而鬥爭，使高老師有些不快。現在回想，如果能委婉一點，也許還能少一些誤會，多一些討論。

高老師出版了那本轟動一時的專著後，經常有人請他演講。他的講座，只要在南京舉行，我幾乎每場必到。那時他已被學界公認為最好的中共黨史專家之一，主辦方給他的演講題目，基本上都是關於黨史的。他對黨史的解釋與官方有很大不同，且有紮實的史料支撐，聽眾通常能獲得一種權威被顛覆、定案遭翻

轉的快感，講座總是叫好又叫座。坐在下面聽的，不僅有學生，還有不少慕名而來的教師。只是每次公開演講前，高老師都需要花幾分鐘時間作「檢討」，請求聽眾不要錄音，不要將講座內容上網，聽過就算，不要傳播，所講只是個人觀點，不同意沒關係，不要上網上線。這自然是他不想捲入麻煩的自保之舉，是一個中共黨史研究者的無奈，更反映了該學科難以發展的困境所在。高老師的主要研究成果只能在港臺發表，觀點常被攻擊，甚至人格常遭侮辱。每次聽完講座，我都會問自己：我有必要去過這種提心吊膽的生活嗎？我如果能學會用英文寫論文，不就可以避免很多審查的麻煩嗎？

作為初學者，我經常向高老師請教研究黨史的訣竅，他建議我「多讀史料，融會貫通」。他對後現代史學有所瞭解，但還是相信歷史是客觀的。他認為研究歷史，就是通過史料的排比，找出史實真相、秉筆直書。他也很強調觀點的平衡，建議讀材料時，不要偏向一種立場，而是要看到一件事情的多個面向。他出生於1954年，父親曾是南京的地下黨，1958年被打成「右派」，遭到迫害，子女也受牽連。由於這種經歷，我覺得高老師研究中共黨史的主要目的，還是希望理解，是什麼導致了自己和家人的不幸？革命為什麼吞噬了自己的孩子？因此，他的選題往往試圖發覆為官方黨史所掩蓋或已經變成神話的歷史，揭示官方不願讓人知道的陰暗面及其制度根源，以達到以史為鑑、啟蒙讀者、推進中國的政治進步的效果。《紅太陽》就是一個在紅旗下長大的歷史學家，根據這種史觀和研究方法，所寫成的一部著

作。我從這部傳世之作中學到最多的，還是〈後記〉中的一句話：「……跳出僵硬教條的束縛，努力發揮出自己的主體意識，讓思想真正自由起來」。

讀洋書

因為各種原因，我沒有在南京大學讀完博士課程，我的學術訓練主要是在美國完成的。2007年我入讀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系，重新攻讀博士學位。我的導師名叫藍澤意 (Fabio Lanza)，意大利人，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博士。他當時還是一位助理教授，沒有任何架子，把學生當朋友。藍澤意教授在政治立場上屬於「新左派」，批評的鋒芒所向，不是中國的威權主義，而是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和歐洲中心觀。他要求我讀的書是何偉亞 (James L. Hevia)、杜贊奇 (Prasenjit Duara)、高彥頤 (Dorothy Ko)、劉禾 (Lydia Liu)、柯瑞佳 (Rebecca E. Karl) 等學者寫的有明顯理論取向的著作，認為這些才是值得一讀的好書。我當時英語能力有限，對美國中國史研究的語境所知不多，這些偏理論的書特別難讀，部分論點還有點類似中共官方論述，有為批評西方而美化中國的感覺。當時為了完成任務，免得去導師辦公室討論時不知所云，只能硬着頭皮啃。但讀過這些書之後，我開始認識到寫中國史不一定只是「多讀史料，融會貫通」這種史料主導、強調貫通的寫法，也可以是將中國作為個案，來修正某種主要根據西方經驗得

出的理論。藍澤意教授現在已經出版了兩部專著，都是這種理論風格明顯的研究，並因此獲得了學界的肯定。

2010年，我轉學至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。我的導師叫林霽 (Arthur Waldron)，曾陪同前國會發言人金瑞契 (Newt Gingrich) 訪問中國。他當時年近七十，已經過了學術活躍期。他是美國校園裏為數不多的共和黨支持者，長期為華盛頓右翼智庫工作。美國學者們研究中國的方法不一樣，有時還大相徑庭。林霽教授對理論取向的歷史研究法嗤之以鼻，對後現代主義理論更是十分不屑，認為研究歷史要少讀理論，多讀史料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目的之一，就是推進中國的自由民主。他的研究路數跟一些中國學者頗為類似，所以我一接觸他，就覺得很親切，他推薦的書一般都是史料紮實、少用理論、文筆優美的學術著作，比較合我的胃口。他是哈佛大學訓練的學者，出版過兩本很有影響力的專著，但他的一些觀點如今被有些年輕學者批評為「冷戰風格」(Cold-War fashion)，可見美國學術研究的代際更新多麼迅速。

美國學界不斷更新換代，推翻舊範式，推出新範式，年輕學者必須趕上潮流，否則很難找到發表文章的空間和就業的機會。我在賓大時，歷史系不少教授正在積極倡導「跨國史」(transnational history) 這一新的研究方法，先我畢業的好幾個博士生的論文都以此為賣點。早在1980年代，賓大幾位文化研究領域的學者就已提出「transnational」這一概念，如今它擴散到歷史學領域。「跨國史」作為一種歷史學的研究方法，至今仍在發展完善中，尚無權威定

義，主要特點是挑戰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。國家有疆域，可謂自給自足 (self-contained)，近代以來的歷史學基本上就是研究各個國家的歷史，如美國史、中國史、日本史等等，底色是民族主義。而「跨國史」的視角則強調，一個國家內部的特徵，深刻地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，同時也影響其他國家。因此，學者需要關注不同國家間的聯繫，勾勒這種聯繫在歷史上的興衰起伏。藉此，我們可以重新發現，因把國家作為研究對象而被忽略或邊緣化的一些處於不同國家之間 (in between)，或跨越貫穿 (across and through) 多個國家的事件、人物、組織、理念、社會制度等。民族國家的視角仍是歷史研究的主流，但「跨國史」這一方法可以深化我們對國家、地區、文明、城市、職業團體、宗教社區等似乎是自給自足的獨立實體 (entities) 的理解。這種跨國族歷史，有別於傳統的國際關係史，它不關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，而是強調不同歷史行動者間的互動，這些歷史行動者並不必然代表各自的國家或政府。

受「跨國史」研究方法的啟發，不少賓大教授開始關注處於國家的邊緣或國家之間的區域，關心在多個國家間流動的移民、信息、商品等。受到這一潮流的影響，我在博士論文的選題上也走向邊緣，確定研究冷戰下的新疆。我的博士論文研究 1949 年中共建政後新疆的去蘇聯化問題，關注的區域大致是今天的伊犁哈薩克自治州。這塊區域與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哈薩克斯坦接壤，1944 年在蘇聯的操控下發生過「三區革命」，建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。我的論文考察的就是在中蘇關係惡化後，尤其是 1962

年發生了約七萬人從新疆逃亡到蘇聯的「伊塔事件」後，中共如何實現對新疆的有效管控：包括驅逐新疆的蘇聯領事館；迫使自我認同是蘇聯人的當地人口離新去蘇；利用新疆建設兵團的力量，沿中蘇邊界建立農場帶以鞏固邊防；封閉邊境，懲罰所謂「裏通外國分子」；修建蘭新鐵路，連結新疆和內地。通過這些措施，終於將百年來幾乎在一切方面與中亞緊密連結的新疆，強行扭轉方向，與內地統合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新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不是在新中國建立之時的1949年，而是在1962年「伊塔事件」發生之後。我的研究並非所謂的「跨國史」，但如果沒有該視角的啟發，我的目光仍會停留在中國內地，而不是投向在做選題時還不曾到過的新疆。通過研究新疆的歷史，我才意識到自己對邊疆的瞭解是多麼有限，用中國中心和漢族中心的視角去看邊疆是多麼偏頗，根本無法理解邊疆居民的認同。通過這個邊緣的視角，我不僅開始閱讀邊緣的歷史，也更好地理解了所謂的「中心」。

美國的留學生涯充滿了挑戰，有語言障礙、文化震盪、經濟壓力，還有如何跟老師和同學們相處等問題。有時這些挑戰讓我覺得無力和沮喪。今天回想起來，留學生涯中，我不曾有過五關斬六將的成就感，倒是有很多敗走麥城的傷感。所幸經過了這一切，我獲得了如何從事歷史研究的一些心得和技藝。留學經歷告訴我，學術是學者間的對話，而不是做一個沒有人做過的題目，填補一個空白。即使是填補空白，我們還是要追問，這個空白為什麼沒有被別人填補過？因為沒有材料？因為這個題目本身並不

重要？還是因為其他什麼原因？寫歷史學的論文和專著時，眼中要有讀者。要考慮目標讀者關心的問題是什麼，你究竟跟哪些學者對話，你的研究定位為什麼領域的研究，中國研究、東亞研究還是全球史？如何讓讀者理解你寫的東西，而且發生興趣？另外一點，學術研究固然應該有現實關懷，但這種關懷還是應該有所限制，畢竟歷史上發生之事與今天的時事並不雷同，不可簡單類比。歷史研究應該去回答學術問題，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。應該多學外語，外語不僅是研究的工具，只有真正掌握了這種語言，才能瞭解以該語言為母語的人的文化，更深地進入他們的歷史世界。最後，更重要的是，學者之間的關係不應該是互相競爭的零合遊戲，而是互為助力的友人。

不如無書

2017年6月我完成博士論文答辯後，去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，因為這是我心目中一個理想的做學問的地方。高華教授曾說，中國研究做得最好的地方，不是美國，而是中研院。他的書房裏長年掛着一張照片，就是他在臺灣訪學時，在中研院近代史所郭廷以圖書館前拍的。當年我和南大歷史系的同門請高老師推薦一本中共歷史的教材，他讓我們讀時任近代史所所長的陳永發教授寫的《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》。煌煌兩大本，論證嚴密，思想自由，觀點犀利，我讀得心驚膽跳。

中研院的確是做學問的好地方。除了郭廷以圖書館收藏的極其豐富的中、英、日文書刊，還有多個圖書館和檔案館。大量檔案及報刊資料都已實現數位化，在辦公室即可利用，實在方便。各種講座、會議、讀書會多到沒有時間參加。近史所有近三十位專任研究員，還有一些已經退休的兼任和通信研究員，他們多是術業有專攻的學者，對學術充滿探索的熱情，是我尊重的師友。

在近史所時，最困擾我的問題，是如何將中文學界和英文學界的中國研究結合起來。在我看來，臺灣學界面臨同樣的困境。所裏的研究員不少有留學英美的經驗，再加上臺灣和美國關係親近，學者對美國的文化影響持歡迎態度。有些研究員雖然以中文作為工作語言，但對話的既有學術史，以及提出的問題都是針對英文學界的。今天英文學界的主流是文化史，近史所越來越多的學者也跟上了這個潮流，此前曾一統江湖的政治外交史研究逐漸式微。我的疑惑是，如果用英文發表研究成果，與西方的既有研究進行對話，自然是理所當然。但以中文發表研究成果，對話的對象卻選擇通常只讀中文材料、不讀中文學術研究的西方學者，這樣的研究是否失焦？畢竟，學術常以語言或國家為限。不少臺灣學者也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進入中國大陸市場，只有在那裏，他們的專著才可能銷售上萬冊，產生較大影響。通過閱讀臺灣學者的著作，大陸讀者固然能瞭解西方中國研究的現狀，但有些舶來的學術問題還是會讓人覺得隔着一層，甚至不知所謂。那些試圖回答西方問題的研究，史料的紮實程度通常非西人可比，得出的結論卻未必更高明。隨着大量西方學者的書籍被譯為中

文，翻譯質量也不斷提高，直接閱讀中文譯本成為更多大陸讀者的選擇。

在此我無意批評近史所的同仁，其實這是一個一直困擾我自己的問題：回到中文學界、用中文發表學術成果時，該如何借鑑西方的中國研究？英文學界根據自身的語境提出問題，有些問題可能具有普世性，但在多數情況下他們討論的問題未必是中文學界關心的。比如在臺灣，隨着去中國化的趨勢不斷加強，臺灣史成為國史，中國史逐漸淪為世界史的一部分，連中華民國史都已邊緣化。當下臺灣人的國族身份仍曖昧不明，學界對中國史的角色定位也任其處於模糊狀態，各自表述，不願深究。然而，無論國族認同如何，臺灣人畢竟仍是文化意義上的華人，擁有獨特的政治社會環境，跟英文語境迥然不同。如果說臺灣學者也有這樣一個難題的話，對於我這樣一位大陸人士來說，這種焦慮更加明顯。用中文發表論文時，誰是我的讀者？該與哪些學者對話？我該如何提問？哪些才是真問題？換而言之，如何將英文學界的研究重新語境化，既能利用自己受到西方訓練的優勢，又不失去中文學界的主體性？這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。

我做博士後研究的接待者是研究邊疆民族史的專家吳啟訥教授，他對我的研究和生活十分關心，我心存感激。在學術方面，他常建議我去找陳永發老師。這也使得我在近史所工作的兩年時間裏，得以經常請教陳老師，有機會觀察他如何融會貫通地應用中英文學界的不同研究理路。陳永發教授是臺灣少有的研究中共的專家，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位，於2004年當選為中研院院士。

他從斯坦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，在美國從事研究多年，對英文學界的前沿研究十分熟悉。同時，他對中文材料瞭如指掌，熟讀國共雙方的史料，並已吃深吃透，心知其意。

儘管熟悉西方套路，但陳永發老師不輕易照搬，而是會放到材料中去檢驗，用常識加以判斷。只有發現西方理論對理解中國歷史有用時，他才會欣然採用。比如，耶魯大學人類學家斯科特（James Scott）提出「道德經濟」（moral economy）這一概念，陳老師認為十分符合中國社會的發展經驗，於是與班國瑞（Gregor Benton）合作，以該理論分析中國革命，於1986年出版了專著《道德經濟與中國革命》（*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: A Critique*）。總體來說，陳老師對隨意將西方理論用於中國歷史研究總是保持警惕態度，但絕不是因為盲目排外，認為外國人一定不懂中國，而是基於自己在美國和臺灣的研究經驗。陳老師研究中共歷史，通常不是從美國或中國大陸的角度，而是從中華民國的角度來看。作為臺灣人，他將中共研究和臺灣社會現實結合，其研究也因此有了現實根基，並非凌空高蹈。他通常會將國共進行比較，研究中共的時候，常常將國民黨納入視野，他關心的大問題是：國民黨為什麼會失去大陸？中共未來能否民主化？陳老師的成名作《搞革命：華東與華中的共產主義運動，1937–1945》（*Making Revolution: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, 1937–1945*）就是分析中共何以有那麼大的動員能力，最後擊敗了蔣介石。

陳老師以全球華人為目標讀者，當臺灣讀者失去對中共甚至國民黨的興趣後，他將目標讀者更準確地定位為大陸人士，

他的文章也通常選擇在香港發表，以便更容易被大陸讀者讀到。比如，他最近一篇重要論文〈延安的「革命鴉片」：毛澤東的秘密武器〉就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《二十一世紀》第168期，意在讓大陸讀者更好地瞭解中共歷史。陳永發老師處理中西研究的做法，對我很有啟發。我在寫研究筆記和書評時，無論是評論中文書還是英文書，目標讀者定位為中文讀者，也通常選擇中文讀者有興趣、能有所啟發的書加以評論，以達他山之石、可以為錯之效。

* * *

收入本書的十篇文章大致可以分為三類。第一類為美國東亞史研究現狀的評述。〈在中國發現歷史 2.0：柯文與美國的中國研究〉一文，通過評介柯文 (Paul A. Cohen) 的學術生涯和學術思想的演變，呈現自費正清以來北美的中國研究範式的轉變：從西方中心轉變為中國中心，再到批判中國中心，提出人類中心觀。最後一篇〈去妖魔化：英文學界之北韓史研究〉則是關於北韓史這個特殊領域在美國的發展情況，具體介紹了北韓史史料的利用狀況、主要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範式的轉變。通過這兩篇文章，本人試圖強調，北美的東亞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脈絡，是從北美自身的語境中發展出來的學科，反映了一種特殊的「局外人」的視角，與中國人研究中國史的語境是不同的。因此，中文學界在評價、

借鑑西方學界的研究成果時，一定要將其放回自身的語境中，否則難免誤讀。

第二類文章分析如何從邊緣視角研究歷史。邊緣視角是近年興起的一個重要研究方法，之前提到的「跨國史」，就是邊緣視角下的一種新方法。沒有邊緣，無所謂中心；從邊緣看歷史，往往與站在中心看到的景象大相逕庭。〈笑史：中國近代史的新寫法〉一文分析雷勤風(Christopher G. Rea)的《大不敬的年代》。通常學者研究笑的歷史，只關注著名作家和演員，雷勤風卻將目光投向晚清以來那些最低俗、最不入流的笑話，以及寂寂無名的笑話寫手和被遺忘的滑稽演員。通過分析這些笑話、寫手和演員，來探測當時中國社會的邊界所在，從而呈現晚清民國的某種社會心態。作者指出，晚清以來的中國史，不只是一部落後挨打的「痛史」，也是一部笑史；晚清民國既是一個民族危機深重的年代，也是一個笑聲不斷的「大不敬的年代」。

邊疆史和外交史也在引入邊緣視角，試圖使老話題產生新意義。邊疆總被邊緣化，民族總被少數化，這是中國邊疆史研究的一大困境。劉曉原的《邊疆中國》提出不能以「中國」限定邊疆史，而應以「邊疆」重新定義中國史。邊疆並非無足輕重，也不是由中心決定，而是有其能動性，有時反過來會影響到中心的走向。通過討論這本書，本人指出，邊緣視角並非要取代中心視角，而是與中心相輔相成，結合兩種視角，庶幾可以獲得對歷史更深入的理解。

從某種意義上，形塑社會是一個壓制邊緣人的過程。為了改變中國人「一盤散沙」的狀況，民國南京政府積極模仿西方，建

構現代社會。它通過引入社會調查等手段來瞭解和控制人口，通過發明所謂的「社會問題」，將妓女、乞丐、人力車夫、遊手好閒者這些「低端人口」，視為偏離正常社會秩序、於國家無用的「越軌者」，加以規訓。政府的干預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主要手段，導致現代國家的權力不斷擴大，而「低端人口」則成為現代化過程中的棄民。

人力車夫是最典型的邊緣人，以前長期無法進入歷史學家的視野，也沒有關於他們的歷史記載。當民主觀念進入史學、身份政治崛起後，人力車夫這個被歷史學家忽視的社會群體也成了歷史書寫的對象，學者們從現代性、城市化、公共領域，以及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等角度，為這群小人物書寫歷史。〈書寫小人物的大歷史：人力車夫與現代性研究〉一文試圖勾勒英文學界涉及人力車夫的研究概況，探討如何通過小人物研究大議題。

本書的第三類文章通過對一些專著的評析，指出國族主義或中國中心觀在從事歷史學研究時的侷限。在研究中國史時，本國學者難免持一種中國中心，或國族主義、甚至國家主義的視角。如研究戰時城市史，在國族主義視角下，淪陷時期的中國城市總被描繪成滿目瘡痍、百姓淒苦、經濟凋敝的悲慘世界，不存在繁榮的消費社會。〈戰爭下的繁榮：汪精衛政權下的蘇州〉一文評析巫仁恕的《劫後「天堂」》一書：原來蘇州這個江南名城在汪精衛政權下曾出現過繁華榮景，茶館菜館林立，旅館和煙館盛行。這個案例可以幫助我們擺脫簡單化的敘事模式，照亮歷史的曖昧模糊之處。

在研究海外華人史時，中國中心觀導致的盲點也很明顯。王賡武的回憶錄《家園何處是》以自己在印尼的泗水、馬來亞的怡保和民國的南京三地生活的經歷提示我們，研究海外華人，不能將他們當成中國人。作為移民，他們長期在海外生活，甚至連國族認同都已發生改變，他們的歷史不只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，也是遷入國歷史的一部分。研究海外華人，需要將他們的歷史與當地土著的歷史相結合，書寫各族群如何共同締造了遷入國的歷史，如此方能解析其身分認同的複雜。

又比如研究近代中日戰爭，中文學界的一般敘事是：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侵略中國，中國人民因此受盡磨難仍堅持抗日、直至勝利。傅高義 (Ezra F. Vogel) 則能在國家間的外交行為之外，看到更微觀層面的個人與群體間的交流與互動。他看到的中日間1500年有史可證的歷史，是一部互相學習、互相幫助的交流史。將中日關係史看作一部兩國「共同的歷史」(shared history)，也有助於中日兩國解開心結，達成和解。

要超越中國中心的侷限，亦可借助比較研究這一史學方法。〈鍛造「新人」：毛澤東時代的大眾文化〉介紹和分析余敏玲的《形塑「新人」》一書。作者指出，形塑「社會主義新人」這一議題，是中蘇皆有的現象。1949年中共建政後即大力宣傳新人的理念與典型，通過小說、電影、教科書和音樂等多種藝術形式形塑社會主義新人。這一過程，深受蘇聯經驗的影響，但亦有不少中共自身的創造。關於中蘇的最新歷史研究指出，極權政府其實並非完全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形塑社會，必須根據民眾的回應不斷調整

政策。這是極權政府面臨的一個悖論：因為缺乏社會足夠的支持，只能依靠強力來維持統治，形成一個所謂「強大的弱政府」(strong weak state)。

歷史的寫法多種多樣，不能只是清儒所推崇的考證，也不應不加批判地緊跟西方潮流，更不該硬性規定讓歷史唯物主義統攝一切。看歷史可以有多個角度，從中心或邊緣看，都有價值；從上往下看 (upside down)，或從下往上看 (bottom up)，都有意義；西方學界研究中國史時採用的西方中心觀、中國中心觀和人類中心觀也都沒有對錯，只有差異。寫法的創新，就是學術的創新。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價值，就是幫助讀者以新的眼光審視過去。歷史的寫法有新舊，沒有優劣。應該採用何種視角，端賴哪種寫法能幫助研究者更好地呈現他們的思考，並能更好地幫助讀者理解那個已經與今人隔了時間、空間、心理三重距離的過去。¹

1 蔡鴻生：《讀史求識錄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8。